清太祖努尔哈赤族属考

——兼论觉尔察氏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渊源

敦冰河

前言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族属，在《太祖武皇帝实录》等清代官书中明确地载为系建州左卫首领孟特穆的直系后裔，太祖的曾祖父福满记为督都，并被追封为兴祖直皇帝。然而这位在清代大名鼎鼎的督都福满之讳，却未像预想的那样为明朝、朝鲜的官书、民间史籍所记，似乎没有领导过建州左卫的经历。明季程开祐认为“奴儿哈赤，王杲之奴”，①这未免持有贬意，以图重振大明国威；茅瑞徵的“奴儿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②似客观叙述。在女真人内部，“九部联军”于1593年合攻太祖之时，乌拉部酋长布占泰曾讥讽太祖“以无名常胡之子崛起为酋长，合并诸部，其势渐至强大。我辈世积威名，羞与为伍”。③十几年后，太祖在率重兵征乌拉之时，叱布占泰无知，④看得出太祖是心怀怨恨而强辞夺理的，但终未能在世人面前以孟特穆的后裔加以反驳。上述记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时人对太祖出身的态度。

在清代已成定论的太祖族属与世系，清逊后，日本史家内藤湖南从史学角度，否定了清帝室的主张，认为太祖非孟特穆的后裔，提出董鄂部首领何和理（清初五大臣）支系为建州左卫孟特穆的直系后裔。⑤三田村泰助先生于其《清朝的开国传说及其世系》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内藤观点，并认为太祖的曾祖父福满是其后人虚构出来的人物。⑥河内良弘先生也认为原建州三卫督都支系在明中期以后，渐至衰落，王杲、王兀堂、觉昌安支配系新兴势力对建州女真社会的重编。⑦近年，国内学者对太祖的出身亦提出了质疑，⑧尽管存在些问题，⑨亦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李鸿彬先生著《清朝开国史略》，对太祖的族属就持慎重态度。⑩孟森先生对爱新觉罗世系曾加以论证，限于史料，亦只能证明其前三世的关系，而不能以史料说明其第四世福满与其父的必然联系。⑪国内大 多数史著仍延用《太祖实录》的清皇室族属之说。目前，可以说对于太祖的族属，在史界尚未取得共识。究其原因，或许是持太祖非孟特穆后裔说之史家只说明了“非是”一个方面的缘故吧。清朝开国君主究属何族，可以说尚是一个谜。

近年，我们在进行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于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发现了一部《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以下略称《谱书》)，⑫这部《谱书》对于解开太祖族属之谜、觉尔察氏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渊源、相互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和有价值的线索。笔者在前辈史家论断的基础上，通过对《谱书》研究，结合有关文献、史料，试图论证爱新觉罗氏与觉尔察氏为同一宗族的亲缘关系，提出了这一血缘关系是源于爱新觉罗氏出自于觉尔察氏宗族。具体地说，即在太宗修纂《太祖实录》之际，将福满以下自觉尔察世系移出，挂靠于孟特穆世系，而这种思想在太祖时代就存在。

清代爱新觉罗、觉尔察、伊尔根觉罗等氏，源于元、明乃至更远的女真族觉罗哈拉，这一点在史界已不成问题。问题是爱新觉罗姓氏的起始时间，1990年，神田信夫先生曾做翔实、有力说明，认为爱新觉罗姓氏始自于太祖建立后金国的1616年，以示种族的高贵。⑬那么，觉尔察氏亦应于此时，自觉罗哈拉中析出，渐成觉尔察氏。

一、清代觉尔察氏的关系及其世系

1. 清代觉尔察氏系出于同祖

众所周知，元末明初，斡朵里女真万户猛哥帖木儿（孟特穆）于松花江下游依兰地方率所属部卒迁至豆满江（图门江）下游地域，再迁至阿木河（今朝鲜会宁）附近，在李满住的推荐下，明朝授其为建州左卫首领。明宣德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儿被七姓野人袭杀后，其弟凡察与其子童山几经波折终于率建州左卫部分部卒于正统五年（1440年）迁徙至建州卫首领李满住的居地苏子河流域。经过叔侄建州左卫卫印之争后，明朝决定，设立建州右卫，由凡察任首

领。清太祖及其后人自认为是孟特穆的后裔，建州左、右卫首领的迁徙路线、时间、定居地可以认为是清代官记爱新觉罗氏的由来。那么觉尔察氏祖先的迁徙与世系如何呢？

据《谱书》载“考察从瓦尔喀以来，觉尔察之高祖兄弟二人，兄名福各，弟名福押努。福押努不知有后无后。福各生子一人，名他克什。他克什生子七人。知道四人之名，其三人之名不知道，四人之名，长索尔火，次图木布鲁，次塔察飞洋武，次塔郎阿。此四人原住在长白山之东，花脸山迤北，卧漠河必罕，鄂多理和陈（原注：即长白山东边旧城），并谋呼阿喇等处居住。其大祖率长子阿喀、次子考巴烟等由旧城迁于长白山觉尔察地方，践土而居。”《谱书》又载“溯自始祖索尔火于明世中叶，迁于长白山觉尔察地方，践土而居，因以为氏。”从这两段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觉尔察氏祖先迁徙的时间为明中叶，其路线为自瓦尔喀到卧漠河必罕（即阿木河）流域的鄂多理城，再到长白山觉尔察地方。这与建州左、右卫首领率部迁徙的史实是一致的。就是说，觉尔察氏祖先索尔火等是随建州左、右卫一道迁徙并最终定居于烟筒山下、苏子河畔的。

《谱书》中未明确指出索尔火的几位弟弟是否与其一道迁至长白山觉尔察地，但从《谱书》中“其二祖图木布鲁之后人，不知有没有；其三祖塔察飞洋武之子嗣，现在京都正黄旗、正蓝旗、镶蓝旗、镶红旗均有；其四祖塔郎阿之子嗣，正白旗有”。看来，索尔火之弟塔察飞洋武、塔郎阿实有其人，其后裔从龙入关，成为八旗的骨干分子。《八旗通志初集》（以下略称《初集》）[14]对觉尔察氏有较详细的记载，现检索出来，进行探讨。

表一

名	姓	居地	旗属	职务	卷次	备注
安费扬武	觉尔察	瑚济寨	镶蓝	清初五大臣	167	塔察飞扬武之后裔（推定）
大海	觉尔察	觉尔察	正蓝	巴克什	236	塔察飞扬武之后裔（推定）
希尔根	觉尔察	觉尔察	正黄	领侍卫内大臣	150	塔察飞扬武之后裔（推定）
雍吉纳	觉尔察	觉尔察	镶红	将军	164	塔察飞扬武之后裔（推定）
星讷	觉尔察	觉尔察	正白	尚书	155	塔郎阿后裔（推定）
巴穆布里	塔查觉尔察	觉尔察	正黄包衣牛录		203	索尔火之后

《初集》中载有觉尔察氏六大支系，上表是笔者自各支系选择而来的代表人物。当然这六大支系不能包括清代觉尔察氏的全部，但可以说是清代觉尔察氏的代表，研究他们与爱新觉罗氏的关系，可以窥知清代觉尔察氏的全体。《初集》希尔根传记中，未载其姓氏和居地，其姓氏是依据《钦定八旗通志》（“人物志27”），其居地是依据《初集》（203卷）其文“雅赖，满洲正黄旗人，姓觉罗氏，世居觉尔察地方”。上述六大支系的世系，在《初集》“旗分志”、“世职表”、“名臣列传”、“勋臣传”等中有部分体现，其中，由于发现了《谱书》，巴穆布里（《谱书》作“班布理”，并姓觉尔察氏）支系的世系最为详细。

上述觉尔察六大支系关系如何呢？《谱书》明确地记载了索尔火二位弟弟后裔所在旗分（参照上引），与《初集》所载觉尔察氏诸人物所在旗分完全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认为清代觉尔察是同出一祖的。《谱书》的初纂者任正黄旗包衣佐领，于乾隆四年（1739年）修纂《谱书》之前，曾参与了核查其家族世系并奏报于宗人府。他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谱书》作为史料，具有较高的信实性。另外以清代官书记载与《谱书》相校，极令人满意。

上表中雍吉纳支系，《初集》（164卷）载有“牛钮，满州镶红旗人，世居觉尔察地方，以地为氏……其族人巴智宜喇赤，以从征积有军功。顺治四年，追叙其功，赠牛录章京世职，以子叶成格承袭……又有名岳洛者，以佐领从征江西……岳洛之子雍吉纳，从征逆贼吴世璠……仕至江宁将军”。在此可以断定牛钮与巴智宜喇赤为同族关系。再据同书《旗分志》（8卷）“第一佐领，初系呼尔呼立管理。呼尔呼立故，以本牛录分得拨什库阿尔泰管理……以阿尔泰之族弟岳那辉管理。岳那辉故，以其子岳罗管理。岳罗从征阵亡，以其子都统岳吉纳管理。岳吉纳升任江宁将军……第二佐领，系第一佐领内余丁。康熙二十三年，岳吉纳管佐领时，分出一佐领，以其叔父护军参领尼鲁管理”，从而可以得出，牛钮（尼鲁）、巴智宜喇赤（《谱书》作“巴吉”）、叶成格（《谱书》作“业成额”）、岳洛（岳罗）、雍吉纳（岳吉纳，《谱书》作“永各那”）为同宗之人。而这支觉尔察氏与福陵觉尔察氏即索尔火支系是什么关系呢？在《谱书》下卷的世系表中，查不出牛钮、岳洛、雍吉纳的名，可是却载有“巴吉”、“业成额”之名，他们为索尔火的六世、七世孙，是父子关系。由此可以察知，雍吉纳支系，与巴穆布里支系为同族关系。

上述各支系，除安费扬武支系居于瑚济寨外，均出身于觉尔察地。另一方面，后面将叙及他们中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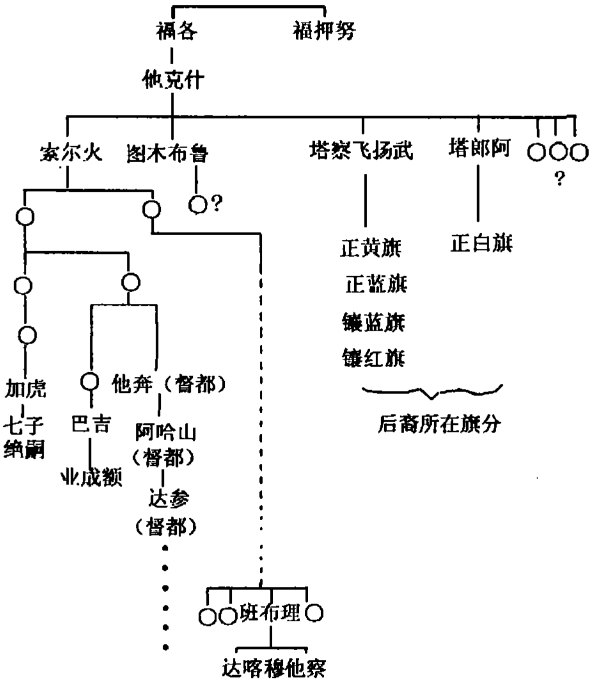
分支系与爱新觉罗或多或少具有亲族关系，从逻辑角度推理他们间的关系是成立的。因此，可以认为清代觉尔察系同一宗族成员，他们是他克什三子索尔火、塔察飞扬武、塔郎阿的后裔。

2. 觉尔察氏与爱新觉罗氏的早期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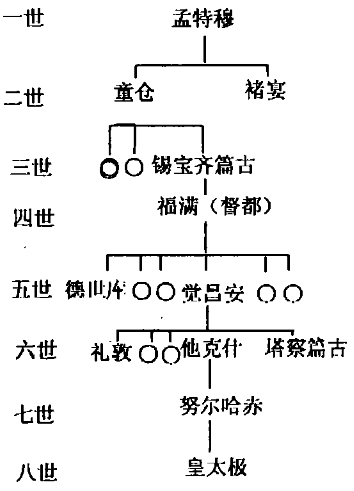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将《谱书》所载觉尔察氏的早期世系和《太祖实录》中爱新觉罗的世系列示意图如下。

表二

觉尔察氏



爱新觉罗氏



下面说明一下上表中两氏辈份平行排列的依据，亦是为下一节的叙述做铺垫。首先从表中班布理同努尔哈赤的关系入手。据《谱书》载，觉尔察氏的某祖曾与太祖毗邻而居，因追捕逃进太祖院内的奴仆时，冒犯了太祖，因而被太祖黜出了宗籍。但太祖“仍姑念同宗之情，仍应从班布理以上写七代，立七代册子。于是往上写恩诏七代，玉牒后兼记”。从班布理起向上溯七代，恰为于觉尔察地践土而居的始祖索尔火。笔者曾于拙稿《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研究》中推测，觉尔察氏某祖获罪于太祖的这一记事大约发生于1587年～1603年间。[15]另据《谱书》记载，班布理曾阻谏太祖，使努尔哈赤避免了一次有生命危险的赴会。在这一记事中，班布理称努尔哈赤为“阿哥”(满语“age”，兄长之意)，就是说，班布理与太祖为同辈份之人。这一记事，福陵觉尔察氏曾呈报于顺治和康熙，清帝并不反感。班布理其人及阻谏太祖之事载于《初集》“勋臣传”(203卷)和《清朝通志》“氏族略七”中，没有称太祖为兄的字样，为太祖的侍卫，这是史家的功夫。另外，《谱书》还记载了一段有趣的史料，“正白旗老坎，查老坎之孙笔帖式永得呈称，太祖在阵未散之际，伊之祖老坎亦在阵内，夺反贼之腰刀，此阵胜了，将手四指割去不全。因在阵内出力，赏给本身一等轻车都尉”，这一记载中的“老坎”，是《满洲实录》卷一1584年4月记事中的“洛汉”，《初集》(210卷)和《啸亭杂录》“续录三”对此事亦有记载，《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略称《通谱》)并记有太祖赐洛汉“觉罗”姓。[16]《谱书》的这一记载是源于顺治年间，兵部在审查是否授与班布理后人骑都尉世职时，参照了授与洛汉世职之例。之所以以洛汉为例，笔者认为，那是由于班布理同老坎曾有共同护侍太祖的经历。老坎事迹（龙敦谋杀太祖时奋勇保卫）的时间是明确的，那么，班布理是太祖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没有问题。班布理阻谏太祖之事，大约发生在移居佛阿拉以前。[17]

其次，《谱书》明确载有加虎及其七子为觉尔察氏的第五世、第六世和战败于觉昌安之事。这与《太祖实录》卷一中有名的记事“又有一人，名加虎，生七子……每各处扰害。时觉常刚有才智，其子礼敦又英勇，遂率其本族六王，将二姓尽灭之……”相吻合，就是说，觉尔察第五世加虎，与爱新觉罗氏第五世觉冒安为同时代人物。另外，在清初户部档案中载有崇德八年（1643年）“赐守天坛太庙堂子福陵人缎布”的名单，“守福陵者……宁塔海牛录下胡希塔、吴喜屯、布喜屯……”[18]，此三人是觉尔察第九世，《谱书》中的胡希他、五喜吞、布喜吞。

对于《谱书》中觉尔察氏最初部分的世系，笔者

尚未发现有力史料佐证其信凭性，仅从《明实录》中检出时间大约相同、读音相近的名字之史料存疑于此。(1)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二月十二日“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奏，举其头目卜颜帖木儿、速哥等，堪任以职，命为指挥，千百户。”“帖木儿”在清代可作“穆”，如孟特穆，那么“卜颜帖木儿”可作“卜颜穆”，这与索尔火的叔祖父福押努的读音接近，“速哥”与索尔火的祖父福各的名字读音亦不远。(2) 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戊寅，赐建州左卫女真指挥同知佟塔察儿等钞绿币表裹纻丝袭衣有差”。(3) 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甲辰，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并升建州左卫指挥使塔察儿为都指挥佥事……”。(2)(3) 中“佟塔察儿”、“塔察儿”系指同一人，都指挥佥事级别高于指挥同知。另外，“飞扬武”，满文为 fiyanggū（老满文为 biyanggū），其意为老来儿或老儿子，明朝官员很可能将飞扬武意译为“儿”。那么，塔察儿与索尔火之弟塔察飞扬武相一致，佟是汉姓，是当时建州部觉罗氏常用的汉姓，佟努尔哈赤可以找到源渊。

二、觉尔察氏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渊源

清代觉尔察氏，可以说户大枝繁，人才辈出，然而这一著姓却未被著录于乾隆九年（1744年）所纂《通谱》，其原因是爱新觉罗氏系出自于觉尔察氏族，觉尔察姓被视为国姓（亚于国姓）所至。

1. 觉尔察氏与爱新觉罗氏亲族关系的依据

《谱书》记载了福陵觉尔察氏的某祖获罪于太祖的家族传承。努尔哈赤在处理这一“大逆不道”的觉尔察氏时，“次日，太祖皇帝出旨，召集阖族人等，将此缘故诉与族人等因，又奉朱批，因我祖要杀家奴未遂，怒砍廊柱各情，理应从重严办，仍姑念同宗之情，仍应从班布理以上写七代，立七代册子。于是往上恩诏七代，玉牒后兼记，抽了红带子，嗣后为陈满洲觉尔察氏”。“红带子”制度是太宗时代形成的，引文中的“皇帝”、“玉牒”、“红带子”等显然是在传承过程中或缮写呈于康熙奏折时所加。但从“念同宗”、“阖族”等语看，太祖视福陵觉尔察氏为同一宗族是没有问题的。引文中的“嗣后为陈满洲觉尔察氏”，由于觉尔察姓氏是形成于1616年以后，其义当是被太祖黜出了宗籍，打入包衣牛录下。

到了康熙年代，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谕“觉罗等原系同祖所生，其犯罪革退者，若不察明，亦将淹没。又宗室、觉罗有弃子为他人收养者，所生子女，俱应察明记载，选秀女时，勿令混入……革退觉罗，俱给紫带……五十九年覆准，革退宗室、觉罗，有前未查入玉牒蓝档内者，既经察明记载，嗣后，伊等所生之子，着该旗出印结，送府入册”。康熙年间的这次查寻被黜出宗籍者后裔的世系及被黜缘由是在所有被黜出宗籍者中进行的。《谱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其支系的查寻过程，并记载了查寻结果。福陵觉尔察支系记载于宗人府蓝档。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谕，宗室、觉罗内，因罪被黜出宗籍者，子孙不入玉牒。因而福陵觉尔察氏的子孙档册，又从宗人府撤出。

以上，福陵觉尔察氏从太祖时代被黜出宗籍到康熙时代重记宗人府蓝档，再到雍正时代自宗人府撤出，可以认为，清代皇家政权对于福陵觉尔察氏的族属，与己同宗是认同的。另一方面，《谱书》下卷自成一册，封面书有“另册觉罗福陵觉尔察氏”，并载“盖谓我先祖觉尔察氏，派衍天潢，系联帝胄”，就是说，福陵觉尔察氏亦将己视为皇族之亲。现今，生活于新宾永陵等地的福陵觉尔察氏后裔，汉姓为“肇”，这与爱新觉罗的部分后裔的汉姓是相同的。

在查寻福陵觉尔察氏子孙时，《谱书》载，康熙说“你的爵位也是觉尔察”，以上下文的意思看，是康熙说，他喜（福陵觉尔察第八世他察支系后裔，系推断）你也姓觉尔察，给永各那写信，将你们祖先的世系详查，呈来。这其中，反映出觉尔察有如“觉罗”，也是爵位。其后便是在将军永各那的协助下，将福陵觉尔察祖先的世系进行了对照、核查，其结果是《谱书》下卷世系的前部分。问题是《谱书》接着记载了由内阁大学士玛起（马齐，富察氏，与王杲同族）将永各那所查世系同“实录”、“玉牒”核对后，奏于康熙的奏折。这一奏折较长，限于篇幅，只略引一部分：“而玉牒内载，大学士达海巴克什（善知清文通翻译也，原注）。三祖之内，有温呆之名，四祖的子之内，有塔察飞洋武之名（即恪恭贝勒，坟在永陵，原注）……六祖孙子之内，有图木布鲁之名，永各那祖宗之名，折子上有沙涞、克德宜、说色、依涞、图木布鲁之名，一样，为此缮折谨奏”。通过研究，可知奏折中的“大祖”、“二祖”……六祖系指宁古塔六贝勒德世库兄弟六人，“注”为修谱者所加。《谱书》中另一处还载有“永各那说，景祖生的五子塔察篇古就是我们的祖宗”，就是说，福陵觉尔察氏认为自己（或许包括永各那）是太祖五叔的后裔。玛起亦将永各那等所查祖先世系同爱新觉罗早期世系牵强附会核查对照而呈奏。查伪满洲国时所修《爱新觉罗宗谱》，上述奏折中的觉尔察氏之名与爱新觉罗氏的名字是对不上的，相一致者，辈份亦不符。通观《谱书》，能够得到这样的印象，觉尔察氏只知自己是爱新觉罗氏的亲族或后裔，而不知爱新觉罗氏系出自于其家族。这当是在入关前就已漠糊不清至康熙年间逐渐湮灭的。《太祖实录》的存在、帝室的主张，谁敢传当代皇帝出于己家呢?《谱书》中在知识面、记忆上的失实是明显存在的。对于爱新觉罗出自于觉尔察氏之事，

康熙等最高机关之人知与不知尚难推定（疑问一定是有的），而太宗时代，皇太极等人是清楚的，这是太宗系统掩盖爱新觉罗家族历史的一个方面。

《谱书》是考订旧谱、转录官方奏折等史料而成，历史感很强，并且在清代，世职、佐领的承袭，谱书是主要凭证，《谱书》为私下伪造的可能性不大。上面的引文中，玛起看到达海之名于玉牒，雍吉纳与福陵觉尔察为同族（前面已说明），就是说依据《谱书》可知此三支系与爱新觉罗具有血缘关系，仅依据《谱书》说明两氏的亲族关系，尚显单薄，且有孤证之嫌，如果其它史料也可说明两氏同宗关系，不仅是对上述论点的证明，也是对《谱书》史料信凭性的佐证。

表一中的星讷支系。据《初集》（155卷）载，“辛泰，满洲正白旗人，姓觉尔察氏。其父阿八泰，在十扎尔固齐之列，兼管牛录事……星内，辛泰之弟，初为二等辖，兼牛录章京”。可知阿八泰与辛泰、星内（星讷）为父子关系，姓觉尔察氏，隶满洲正白旗。再据同书《旗分志》正白旗满洲都统第五参领，第七佐领，系国初编立，始令觉罗阿特泰管理。阿特泰从征阵亡，以其子新泰管理。新泰亦从征阵亡，以其弟星讷管理……”。阿特泰即阿八泰，觉尔察氏阿特泰名前冠以“觉罗”二字，这对佐证本文论点是重要的。阿特泰非爱新觉罗“六祖子孙”（不见载于《爱新觉罗宗谱》），而其名前冠以觉罗爵位，与六祖子孙（除宗室）等同，这说明阿特泰支系与太祖是同宗的。阿特泰是于太祖时代（1609年）“奉命摄本翼总统，给兵符往救（宁古塔），击败图勒申，因受伤而卒。”[19]其名前所冠觉罗，当是在崇德年间“宗室、觉罗”定制以后所追加。其子星讷是清初比较活跃的人物，但满、汉文档案中尚未发现觉罗星讷的记载。通观清代觉尔察与爱新觉罗的关系，不能认为阿特泰名前之“觉罗”是笔误。[20]由此可以察知，清代“六祖子孙”的概念，并非《太祖实录》所载，于太祖举兵时就存在（后面还将叙及），爱新觉罗姓氏是逐渐界定于“六祖子孙”的。

表一中的大海支系。在清代官书中，大海支系与爱新觉罗氏为同族关系未曾直接表明。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首段的附录中，载有“达海世称满洲圣人，其支下子孙皆用紫带，其女不挑秀女”。“女子不选秀女”，这与女真族“同族不同婚”的族外婚制密切相关。关于“选秀女”，清代《户部则例》一中“户口日选验秀女”条中，对不能选作秀女者，做了规定，但无达海子孙之女不能选秀之条款。郑天挺先生在论述清代选送秀女之制时，依据《清史稿》“达海列传十五”，“达海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其子孙男系紫带，亚于宗姓，女子不选秀女”，将达海子孙之女不能选送之条加入《户部则例》的规定之中。[21]鸳渊一先生在解释《清史稿》“达海传”中这一记载时，做了种种推断，但可以看出，老先生自己也不满意，是无可奈何的。[22]女真族的族外婚制是达海子孙之女不能选作秀女的实质性原则，达海子孙的档册或许报送宗人府，有如《谱书》所记，而户部未做特别规定。

关于达海“其支下子孙皆用紫带”，首先可以说，这表明达海支系与爱新觉罗家族具有亲族关系，达海支系是为时人视为准皇族的。这一“系紫带”有着特殊经纬。下面从太祖处达海死刑谈起。据《满文老档》1620年3月载，有一位名称纳扎之女经汗福晋允诺，与达海二疋布而成奸，被告发于太祖，太祖责斥了福晋，“遂拟达海、纳扎以死罪。汗复详思，男女皆死，罪有应得，唯杀其男，则再无如达海通晓汉文、汉语者，遂杀纳扎。至于达海，缚以铁索，钉于粗木而囚之”。太祖处达海以死刑，惜其文才，从宽免死。《老档》虽然未载达海与太祖同宗，但太祖是视达海为同宗之人，此时“六祖子孙”的概念尚未形成（后面将述“六祖子孙”概念形成于迁都辽阳以后）。在这一事件中，笔者认为免于死地的达海本人在名誉上是被黜出了宗族。其后，因达海与汉人交往过密，并接受汉人的馈赠，为太祖所猜忌，又被太祖施以已不加刑于皇族成员的“贯耳鼻”之刑。[23]达海与太宗同龄，从《老档》中看得出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他们儿时一定有过共同习汉语的经历。太宗即位后，达海更加活跃，不意，病魔使达海英年早逝，太宗倍感突然和悲痛，破文官世职不世袭之例。[24]天聪九年（1635年），确定“六祖子孙，俱系红带”之制后，笔者认为，太宗鉴于达海支系为“六祖子孙”以外宗亲，达海的功绩以及达海在太祖时代的“不名誉”，赏赐达海支下“男系紫带”作为准皇族的标志。这一点从《老档》1636年2月的记事和康熙五十二年后，被黜宗籍者后裔“系紫带”能够得到一些理解。《老档》载为“初十日，汗以巴克什达海精通汉文典籍，尽力辅佐王政，注念不忘，召达海三子至，飨以美食……仍论其子陈德依勤习汉书”。在此前后，太宗曾多次于宫中宴请皇亲和姻亲。太宗制定系“带”的本意，主要是作为皇族的标志，表明身份的高贵和争执时不可骂及祖先。崇德三年（1638年），进而制定宗室系黄带，觉罗系红带，表明等级的变化。就是说，达海支下子孙所系紫带，其本质是因为与爱新觉罗为亲族，是被作为准皇族的标志。限于史料，还不能说明“系紫带”或其它颜色之带在其它觉尔察氏中是否实行过。达海支下子孙之带是取决于达海功绩和与太宗的关系，并在与太宗为同族的前提下。此时“紫带”中，达海“不名誉”的色彩并不重，被削宗籍的莽古尔泰等子孙，被打入包衣牛录，并不系紫带。到了康熙五十二年以后，紫带完全是被黜宗籍者子孙的皇族标志。康熙之所以选择紫带正是借鉴了达海子孙所系紫带中的“不名誉”色彩，否则，不是对“满洲

圣人”的侮辱吗？从上面的论述可知，达海的姓氏觉尔察被视为“亚于宗姓”，清政权给予觉尔察氏这一荣誉，是有其本质原因的。

表一中的安费扬武、希尔根支系尚未发现可资直接说明他们与皇族为同宗的史料，但疑问是存在的，后面略述。

2. 觉尔察姓氏的由来

觉尔察（满语为 giorca），也作觉尔禅（满语为 giorcan），在一些史籍中，也有作觉罗尔察和觉罗尔禅。觉尔察的满语可以分解为 gior + ca，就是说，觉尔察、觉尔禅是由觉罗（gioro）急读加“察”（ca）、“禅”（can）而来。增井先生在研究觉尔察姓氏的由来时，否定了《清稗类钞》中觉尔禅系赐于非正支的宗室者私生子的姓氏，指出觉尔察姓氏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姓氏，其含意为觉罗氏的小型化。[25]无疑增井先生的上述论断是很有见地的。但认为觉尔察姓氏是由于觉尔察诸支系分别有因黜出宗籍和奴仆（包衣人）阶级（安费扬武支系）而被人为地创作出来，笔者有不同看法，简述如下。

首先笔者不能赞同觉尔察诸支系分别有曾被黜出宗籍的经历。表一中希尔根、星讷、雍吉纳支系之人，没有被黜出宗籍的史料记载，他们的传记中，清楚地记载着他们的功过和赏罚。[26]在清代，被革除宗籍之缘由，其本质是争夺皇权，对皇权产生威胁之罪，太祖时期有因大不 敬而被削籍者。上述觉尔察诸氏的被罚之罪，均构不成对皇权有威胁的大罪。他们的姓氏不是源于被黜宗籍，也不是被黜宗籍的标志。

《谱书》记载了太祖宗族最早被黜出宗籍者的史料。这一史料是福陵觉尔察第十一世盛京副都统扎勒呼（《初集》作“巴勒”）[27]依据家族传承，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奏呈于康熙的奏折。这一被黜宗籍事件是发生于佛阿拉时期（1587～1603年），[28]奏折中“嗣后为陈满州觉尔察氏”，是将后来形成的觉尔察姓氏加入传承中，其本意是其后裔被削宗籍打入包衣牛录，与其他宗人相别。清代觉尔察唯有福陵觉尔察班布里支系隶内务府。这则史料不能作为觉尔察姓氏由来的依据。《初集》将班布理的姓氏记为“塔查觉尔察”。其后修纂的《清朝通志》“氏族略七”亦将班布理的姓氏记为“塔查觉尔察”，并且与清代觉尔察其他支系相分别，另立一条。《初集》巴穆布里传的撰写，显然是依据顺治十四年（1657年）班布理之孙守护福陵的珲他等人追述其功要求恢复“品级”的奏折（见《谱书》），或是依据康熙五十七年扎勒呼的奏折。《初集》修撰者不可能将太祖陵名冠于觉尔察前以示与其他觉尔察氏相区别。永各那将军及福陵觉尔察认为自己是太祖五叔之裔，如果“塔查”来自于太祖叔塔察篇古，那么，说明《初集》修撰者及时人（包括康熙）将福陵觉尔察氏视为爱新觉罗之后。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说明康熙错将福陵觉尔察视为塔察篇古之后而查其世系入宗人府，本稿将有较大后退。[29]《谱书》下卷载有明确的世系，为什么《谱书》听从永各那之言，认为自己是塔察篇古之后呢？有待进一步探究。无论怎样，“塔查觉尔察”姓氏与班布理支系被黜宗族者似乎有关。然而塔查觉尔察作为姓氏在福陵觉尔察中并未实际使用过，《谱书》几经修选，都主张自己姓觉尔察。

那么，觉尔察姓氏的由来如何呢？表一中星讷之父阿特泰在《初集》（155卷）附于其子辛泰传中，作为觉尔察氏，而在同书《忠烈传三》附于郭科传中，其姓氏作“觉罗氏”，前面曾述阿特泰没于1609年。表一中希尔根之父雅赖是跨太祖、太宗时代的人物，其姓氏在《初集》（203卷）中，作“觉罗氏”。《初集》中关于觉尔察氏的姓氏未行划一，反映了觉尔察姓氏的形成过程。而这一形成过程与清入关前皇族的确立过程密切相关。

清代爱新觉罗宗族的形成，并非像《满洲实录》给人的印象，即在太祖统一建州各部后，便形成了以宁古塔六贝勒子孙为成员的皇族（汗的宗族 hani uksun），就是在太祖建立后金国之后，皇族的范围仍未界定于“六祖子孙”。《旧满洲档》（以下略称《旧档》）中“六祖子孙”称谓（与太祖、太宗的关系）的诸事例，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清入关前爱新觉罗宗族的确立，是在太祖迁都辽阳以后。[30]限于篇幅，仅举一例，简要叙述结论。《旧档》1620年3月，旺善名前的“汗的宗弟”（han i uksun i deo），明系后来所加，其后6月中，显系未行添补。[31]到了1622年7月，便均以“叔”表明关系，如铎弼叔。[32]迁都辽阳之前，太祖视“六祖子孙”为“诸贝勒支系”[33]而非汗的宗弟等。就是说，清代皇族初以太祖兄弟支系为主，迁都辽阳后，扩大到“六祖子孙”。1616年，太祖创制国姓后，亦应是如此。太祖对本支兄弟之人是重视的，授以名号、贝勒、台吉、阿格，对于“六祖子孙”（塔克什以外支系）是漠然的。此时，觉尔察氏地位与“六祖子孙”大体相同，只是被视为同宗。1616年以后，经萨尔浒、征叶赫等频繁的大规模战争，夺取了辽阳。明退守松锦，尚处惊弓之状，辽沈安宁。太祖得以整备诸制度，适应新发展。“六祖子孙”在战争中的表现，使爱新觉罗血缘集团最终确立。显然，觉尔察氏支系已远，被界出了皇族（han i uksun），但作为同宗之人，仍有较大的惯性而延续着。到了太宗时代，礼制、等级制度次第整备，皇族诸制度纷纷登场。在修纂《太祖实录》时，太宗制定了符合“国史”需要的诸原则，系统地改纂了爱新觉罗家族前史。在这一过程中，觉尔察姓氏确定了，与德世库居地之名划一。这便是后来史籍中的“以地为氏”。[34]觉尔察姓非如伊尔根等氏那样形成，具有人为创作的政治性，是仅次于国姓的贵种姓氏，这与爱新觉罗氏出自于觉尔察氏族密切相关。

关于安费扬武的姓氏。笔者认为安费扬武原姓“觉罗”，而非太祖赐姓“觉罗”。赐姓觉罗，不论是前面提到的汉人“洛汉”，还是扈尔汉（清初五大臣），归根到底，后来都以原姓出现，而所赐之姓成为一种荣誉。清初五大臣中，三位为“额驸”，一位赐姓“觉罗”，为史料所明记，皆与皇族有关，独安费扬武皆无，太祖并非不会笼络，而因安费扬武即是“宗人”。觉尔察姓氏确定后，在清初人的概念中，姓觉尔察即是爱新觉罗的亲族。《太祖实录》卷一中载有兆嘉城主理岱引导哈达兵劫太祖所属瑚济寨。在这一记事中，理岱名后有一小注，“李岱亦宗人”，此理岱非六祖子孙索长阿之子礼泰，一则他们名字的满文不同，再则在《太祖实录》中，表示太祖与六祖子孙间的关系时，均以叔伯兄弟表示。此“宗人”为觉尔察氏族之人。太宗将此人记为“宗人”，是在界定爱新觉罗为六祖子孙所有后，将同宗之人理岱记为宗人。安费扬武及其后人，当也是此种情形，而其觉尔察姓已表明同宗之人的关系。理岱是被征而“恩养”，非来归，其后人是否姓觉尔察难以想象。另外，认为安费扬武由觉罗转姓觉尔察是由于其父为包衣人，笔者不能赞同。诚然，《初集》（167 卷）记安费扬武之父完布禄早年“侍太祖”，且《太祖实录》卷一记延布禄（被认为与完布禄同一人）为包衣人，但清代包衣身份是世袭的，安费扬武不属包衣牛录，其传记（同上）载“早年来归”，且看不出安费扬武具有从奴隶（奴仆）到将军转变的轨迹，他归太祖后，即刻从军，在上述理岱引哈达兵记事中（1584 年），载其为“部将”（amban，大臣之意）。另外，康、乾重修《太祖实录》将延布禄改记为“近侍”。[35]安费扬武之得姓，与其他觉尔察支系相同，并不特殊。

在《爱新觉罗宗谱》觉罗系的妻氏中，有“觉尔禅”、“觉罗尔禅”出身者，大约在康熙前期。[36]在清代皇族婚姻制度中，要求必须注明妻氏之父姓名，作为史料，是有信用的。这是本文论点的反证。如果强做解释，那是因关系已远，且没有明确规定，康熙五十二年后，圣祖或许在忧虑“秀女”问题时进行了制止，有待尽检、说明。

结　　语

综上所述，从爱新觉罗与觉尔察两氏的亲族关系及清代觉尔察氏诸多“特殊现象”，是否能够引起对爱新觉罗族属的重新思考呢？进而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赞同史家对《太祖实录》中爱新觉罗世系的否定，从爱新觉罗与觉尔察两氏的亲族关系和在清代对觉尔察氏的特殊反映出发，并参考其他伊尔根觉罗氏等少有与皇族亲族关系的史料，笔者认为，爱新觉罗氏是出自于觉尔察氏族，即清太祖的族属为觉尔察氏族，为太宗在修纂《太祖实录》时所隐讳。这反映了在后金国 向大清国转变过程中，太宗秉承太祖思想，进一步明确表明爱新觉罗血缘高贵之由和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掩盖了自己“建州枝部”的出身，是系统改编爱新觉罗家族前史的一部分。孟森先生以“四亲”说解释追尊兴祖之由，[37]使人难以理解。功名不显的福满，何“兴”之有？而追尊兴祖，正是太宗自福满从觉尔察世系移出，挂靠于建州左卫都督世系的合适注脚。为了“大业”，太宗即奉他人之祖为己肇祖，又眷顾自己真正祖先的后裔，太宗的这一心态不能看过。清政权对觉尔察与己同宗是认同的，这也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将觉尔察视同国姓未著其中的缘由。觉尔察氏被视为国姓（亚于国姓）和准皇族地位的转落当在乾隆中期。上述《通谱》后二十余年，《清朝通志》便将觉尔察姓作为普通满州姓氏辑出以补《通谱》不足，这应当说反映了乾隆的意志。此后，对觉尔察姓氏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啸亭杂录》、《养吉斋丛录》、《清稗类钞》、《清史稿》为代表。[38]而本稿能予以辨明真伪。前面所述理岱“宗人”，太宗尚视其为宗人，而康、乾重修《太祖实录》时这一小注便显得多余而被删削。另外，觉尔察氏族的加虎及七子，战败于觉昌安，现在可知，觉昌安之崛起是与其孙太祖一样，是从慑服族人开始的同室操戈和骨肉相残，且反映了觉昌安穆昆、加虎穆昆已从本哈拉中析出、独立，表明觉尔察哈拉历经五世开始分化的过程。建州巨酋王杲系出自于富察氏，[39]觉昌安系出自觉尔察氏，均非原建州诸卫酋长之后，他们的崛起，表明建州新兴势力抬头和旧势力的衰落，社会在急骤地变革。

从被黜出宗籍的福陵觉尔察之宗人府的进出，尽管尚乏证据，但可以推测，其他未曾被黜出宗籍的觉尔察之部分档册，或许曾由宗人府管理。鞠德源先生指出，玉牒档案中之人有许多《爱新觉罗宗谱》未载者，[40]其中是否包括觉尔察氏呢？有待探究。对于研究爱新觉罗与觉尔察两氏关系，仅仅从两氏为同宗角度去考察，容易流于一般且有较大局限性。如果从爱新觉罗出自于觉尔察而此点又为清政权所掩盖这一角度，研究皇权对觉尔察的处理、态度的变化是有趣的，它有利于探讨清代皇权、皇族制度的特殊性。应该说，研究清代觉尔察氏是研究清代皇族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

①《筹辽硕画》“东夷奴儿哈赤考”。

②《东夷考略》“建州”。

③《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三十八年七月戊子（1605 年）。

④《满文老档》第二册辛亥至癸丑年（1612～1613 年）。

⑤《清朝姓氏考》，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日本）。

⑥《清朝前史的研究》1972 年（日本）。

⑦《明代女真史的研究》“第二十一章建州三卫的消灭和新势力的抬头”1992 年（日本）。

⑧薛虹：《努尔哈赤的姓氏和家世》，载《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第4期。

⑨李治亭主编，姜守鹏、刘奉文著：《爱新觉罗家族全书》(2)《世系源流》35、47页，指出了薛虹上述论文的不足之处。

⑩李鸿彬著：《清朝开国史略》1997年。

⑪《满洲开国史》"兴祖直皇帝补纪"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史论著集刊》(下)"清史稿中建州卫考辨——内函清兴祖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⑫《满族家谱选编》(一)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⑬神田信夫《爱新觉罗考》，载于《东方学》八〇，1990年(日本)。

⑭《八旗通志初集》李洵、赵德贵主点，东北师大出版社。

⑮⑰拙稿《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研究》待发表。

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74卷"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

⑱《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1990年。

⑲《八旗通志初集》155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⑳在界定皇族范围以前，乃至以后，觉尔察氏是被视为宗人的。崇德年间，宗室、觉罗制度细节化后，笔者认为，整理旗分档册之人，或许见到原档册中有阿特泰与太祖同宗字样，因而加觉罗于其名前。《八旗通志初集》是依据原八旗旗分佐领档册照录。《钦定八旗通志》未被删削。另外，表一中的希尔根，《八旗通志初集》150卷其传中，未载其姓氏和居地，载"初随侍太宗文皇帝于藩邸"、"定鼎燕京……以希尔根系太宗眷顾大臣，加半个前程"。希尔根是康熙朝著名将领，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通志初集》作者不可能不知其姓，是否是在入关前的满文档册中，载有希尔根是太宗的"眷属"侍卫而非眷顾大臣呢？然而其又非六祖子孙，因而对其姓氏难以确定，索性不载。而《清朝通志》"氏族略七"，明载其姓氏和居地，且为正白旗，这与太宗即位前所领之旗是相符的，这说明《清朝通志》作者看到了较早的档案。《八旗通志初集》记希尔根属正黄旗，未载其姓氏与正白旗觉罗阿特泰有异曲同工之感。

㉑郑天挺：《探微集》，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

㉒鸳渊一：《满洲碑记考》"达海巴克什的墓碑"，1943年(日本)。

㉓《满文老档》第三十二册天命七年正月(1623年)。

㉔《清太宗实录》天聪六年(1632年)8月29日。

㉕增井宽也：《满族觉尔察哈拉考》，载于《立命馆文学》第544号1996年3月(日本)。

㉖见表一及《钦定八旗通志》147卷(希尔根)、157卷(星讷)。

㉗《八旗通志初集》"驻防大臣年表三"。

㉘"赫图阿拉"作为地名在清初并未实际使用过，后金迁都辽沈后，常以佛阿拉指此地。拙稿《赫图阿拉城名考》待发表。

㉙"塔查"之来源，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来自于班布理之子"他察"名。《谱书》载他察"顺治元年奉旨命看守福陵，于十三年奉文拨归福陵关防所属镶黄旗，遂驻居焉，其后裔子孙之名另载伊谱书辈次也。"从年龄上推算，顺治十三年，他察当已过世，其孙辈袭职。另外同居一地，共同供职于福陵，此地觉尔察在首次修谱即各自分别立谱，在满族家谱修纂习惯中，非常少见。因此笔者曾推断他察很可能是获罪于太祖、被黜宗籍的"某祖"。

㉚拙稿《清入关前爱新觉罗宗族的确立》待发表。

㉛《旧满洲档》第一册423页，432页、433页。

㉜上书第二册747页。

㉝上书第一册441页，原写beisei giran，后涂改为"汗的宗弟"(han i uksun i deo)。在太祖多次表扬下，老将额尔德尼修史更加精进，从书法角度看，工整、连贯，有重抄的迹象，在重抄本上又多有涂改，同书同册44页述太祖叱布占泰时，三次出现的爱新觉罗没有涂改，显系重录之因，而325页1615年12月的"同族的伯叔们、兄弟们"是泛指，包括六祖子孙甚至觉尔察，是由于"uksun i amjita eshete ahūta deote"中"uksun"同"han i uksun"是有区别的。

㉞拙稿《努尔哈赤祖居地考》，载于《满族研究》1996年第4期。

㉟今西春秋：《对校清太祖实录》(日本)。

㊱《爱新觉罗宗谱》己册3022页、3044页。

㊲孟森《清代史》"清代种族及世系"1961年台湾。

㊳《啸亭杂录》"续录卷三""国初太祖时，以瓜尔佳信勇公费英东……觉罗公安费扬古为五大臣……"；《清稗类钞》"姓名类""宗室、觉罗"条，"宗室与人私生子，则不入属籍，赐姓曰觉尔禅，犹言非正支也"及"满洲八大贵族之姓"条"伊尔根觉罗氏敏壮公安费扬古之后……"；《养吉斋丛录》卷之一"又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觉尔禅者，乃其所受之姓，与宗族之称觉罗不同"。上书及《清实录》关于达海的史料见正文。

㊴拙稿《王杲姓氏小考》，王杲与沙济富察氏为同族，沙济富察氏之后裔马齐、傅恒、福康安等著名，待发表。

㊵鞠德源《清代皇族人中人口申报制度》载于《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载于《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1988年，北京中华书局。

(作者敦冰河：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